

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

近年政府積極擴展專上教育。從高級文憑、副學士，到自資碩士課程，自資學位已超越受資助學位，成為大學的一大財源，但這同時亦引發學歷通脹，乃至社會不穩的疑慮。過去一年的統計署資料顯示，20至24歲具大專學歷的就業人士入息月入中位數為11000元，竟與經濟遠遜現在的1997年持平。可見，學歷通脹正把更多高學歷的年輕一代推向貧窮線。事實上，在國家層面，增加高等學位是否有利於經濟發展？個人層面，它能否帶來社會上流的機會？又或成為社會動盪的溫床？

「書中自有黃金屋」是我國根深柢固的觀念。對此，教育統計研究上亦有所顯現。學者Kimko審視了1960至1990年OECD的經濟及教育數據，發現PISA數學科成績每增加47分，每年國民生產總值便額外增加1%。為什麼教育能拉動經濟？不同學者試圖提供解釋：傳統觀點認為，教育能為工商業發展培訓合適的高技術員工，支持各行各業發展與擴張，又或教育催生更多創意產業，拉動經濟發展；社會學觀點則認為，畢業生工資隨教育程度增加，會更捨得花費，產生滴漏效應（Trickle-down effect），讓財富下流，讓整個社會得益；人力資源觀點則認為，受教育的市民更着重自己健康和體質，從而提升工作效率，增加社會產力。總括而言，上述學者均贊成教育發展能幫助個人脫貧，又或拉動地區經濟發展。

教育能拉動經濟？

踏入二十一世紀，不少學者循教育質量，對兩者關係作進一步探討。如北歐學者Hanushek認為教育統計以在學年期為量化數據，無視SES、家庭、地區文化等差異是不準確的，例如學生在伊朗接受一年可蘭經為本的宗教教育，與在芬蘭接受一年的探索教育，便有明顯不同；Murphy則關注學科差異，其研究發現工程系畢業生數目比起法律學系更有助拉動經濟發展，蓋因後者會引發尋租行為，即更多人透過法律或行政手段奪取和鞏固個人利益，增加社會整體發展的成本。

此外，另一些學者則從環境配套的方面，指出「教育拉動經濟」論點的局限。例如Pritchett審視相關數據後，發現教育與經濟發展的相關性只在OECD已發展國家才成立，在秘魯、菲律賓、迦納等發展中國家，其相關性並不顯著。Godo & Hayami同樣認為教育未必能拉動經濟，他們審視二戰前後的日本教育與經濟，指出技巧和知識不能直接轉化成產力，必須結合機械。然而戰前日本人力過盛，機械太少，大量增加的高學歷人口成為社會不穩，乃至向外擴張勢力的源動力；Assad則認為與國家政策相關，因不少專制國家為了政治穩定，會聘請大部分高學歷畢業生，而學生則視學歷為長期飯票，這見於北韓，又或埃及、伊朗等伊斯蘭地區。簡而言之，要實現「教育拉動經濟」的假設，必先有政府政策及足夠資源或科技配套所支持。

除國家層面以外，近年在個人層面的「教育脫貧」論點亦受到不少學者所挑戰。Pritchett 指出，隨着受教育者愈來愈多，僧多粥少情況下，回報率自然減低，減低學生接受教育的意欲。當專上學位超越適齡人口 50%，各院校的收生困難便會增加。

增加社會不穩定

另一方面，受專上教育的年輕人突然增加，卻未得到相稱的工資回報時，便容易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因素，例如六七十年代席捲歐美的左翼思潮、八十年代末的南韓學運、近年埃及與利比亞顏色革命等。當然不同時空與地區的學運，也有其獨特社會原因，但高等教育擴展確實間接增加了不滿政府的反對力量，蓋因學生能從「不得不反抗」的運動中逃離就職現實，建立自我認同，透過挑戰權威來找到生存實感。

諷刺的是，這似乎述說了教育與經濟相關的另一可能性：教育不一定拉動經濟發展，倒是經濟繁榮的地區，才有資源投資教育，刺激人們的升學需求。故此，不少學運或革命均發生於經濟高速發展的中後期，而非經濟危機之時。

誠如思想家福澤諭吉於《貧富智愚之說》中所言：「窮人的智慧是最可怕的，因為他們會知道痛苦之所以存在的理由，但現實中卻永不能平等，他們便會成為社會黨，攻擊現行制度……讓窮人得到教育是有害的」。福澤所言也許較為偏激，但高等教育高速擴展，在刺激經濟發展的同時，確有可能賦予部分年輕人不恰當的期望，引起社會動盪等副作用，這實在需要社會各界共同深思。

撰文：梁亦華 香港教育大學項目主任

教育版徵稿

《信報》教育版誠徵來稿。學校校長、老師、教研工作者、學生可以分別投稿至「校長開壇」、「教研陣地」、「學生樂園」，每篇文章約為 700 字；至於各教育界資深人士可投稿「教育講論」，文章約為 1200 字。來稿請註明有關職銜、投稿欄目、聯絡方法，以及所屬學校或教育機構，並且電郵至 sunnyhui@hkej.com。本報有最終採用權。

#梁亦華 #優質教育 #教育講論 - 高教擴張與社會動盪